

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关系研究之我见

虞和平^{1,2}

(1.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淮河流域是中国的七大流域之一,在上古时代更是第三大重要流域,它像各个流域一样也有自己的文化,应该予以大力研究。淮河文化有怎样的内涵元素、精神特质、发展轨迹,人们已有所认知,学界也有所研究,但尚待进一步探讨。对于淮河文化的区域界定不能完全采用流域的界限,而应以干流流域为主,兼及合理范围的两岸和支流地区,并从中揭示土生土长的淮河文化;它的精神特质主要是由其特殊地域位置决定的多元性、依存性、兼容性和开放性;它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接纳和受力于外部文化,南宋以前主要来源于黄河文化,南宋以后主要来源于长江文化;面对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建设,对皖北地区来说,研究淮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关系尤为重要。

[关键词]淮河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区域发展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02.009

淮河文化以往鲜为人知,更不受重视,在早年的历史研究中也很少涉及,近几年来则有勃然兴起之势,学术论著多有发表,学术会议相继举行。^[1]这种发展势头的动力当然与当地政府的方地方发展战略及学界的积极配合有关,也与近年来史学界大力开展的区域史研究相应。区域文化是区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如何才能更好地把区域文化研究与区域社会经济建设相结合,则既需要切实认识和深入发掘区域文化的历史源流、内涵要素和精神特质,也需要以现实的区域发展方向为依归。这也是淮河文化的研究者们所共同追

求的目的,已有不少学者论及此题,本文亦在学习各家论著的基础上略谈一点看法。

一、淮河文化的区域界定和内在特质

对于淮河文化的区域范围,现有的研究大多认为就是整个淮河流域,即淮河干流全线及其全部支流所及的地域。具体而言西起伏牛山、桐柏山,东至黄海,北达古黄河南岸(包括现在的郑州、开封、淄博一线),南至大别山和皖山余脉、长江下游北岸。

据此,淮河文化就将这个区域内产生和进入过的所有文化元素均囊括在内。具体说法是:淮

作者简介:虞和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河流域是苏、鲁、豫、皖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夏商周三个朝代建立之地。其“文化空间”在淮北地区包括旧石器时代位于现今山东沂源县境内的沂河上游的沂源猿人文化,新石器时代的仰韶、裴李岗、龙山、大汶口文化,以及曾经进入淮河两岸的楚文化和良渚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老庄道家学说,孔孟儒家学说,韩非、李斯法家学派,墨家学派;以及秦汉以后的以寿州和扬州为主的淮南文化。

上述淮河文化区域的划分,东西两极界限清楚,南北两翼界限之分虽从流域水系上来说不无道理,但尚可斟酌。如按照上述划分,则黄河南侧、济水流域、长江下游北侧均成了淮河文化的区域。淮河与黄河、济水、长江是中国上古时代被称为“四渎”^[2]的4条主干河流,也各有自己的流域文化,尤以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为要,均已形成学界的共识,有多种著作出版。^[3]如按上述划分方法,除了皖北分水岭以南的皖江文化、庐州文化之外,黄河中下游以南至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地区都成了淮河文化的区域,其他“三渎”的文化都不见了。这难免使人联想中华文化(特别是有文字记载的文化)的原始文化似乎是以淮河文化为主体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退居其次了,或是被淮河文化包含了。不知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研究者会有何想法?就此而言,对淮河文化区域划分,不可简单地把支流所及的地区一概划到本区域之内,还需要考虑淮河支流区域与黄河、长江干流及其支流的地域关系和人文关系。如黄河南岸的有些地区虽然是淮河支流的上游和源头地区,但它也是黄河干流和支流附近的地区,两个水系互相交错;淮河下游与长江下游之间除了运河之外别无支流关系可言,江淮之间地狭而互相连接,其文化虽互有所融,但亦各有主次。因此,从中国古代江河流域文化结构的全景来看,兼顾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区域范围,淮河文化的区域范围似应以淮河干流流域为主,兼及合理范围的两岸和支流地区。

除了上述以河流划分的相邻流域文化关系

之外,淮河文化还有以国族地区划分的相邻地域文化关系。这主要有西北面的中原文化、东北面的齐鲁文化、西南面的荆楚文化、东南面的吴越文化。淮河中上游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为楚国之地,寿春曾为楚国晚期的都城,其文化自然亦是荆楚文化之一部分,现今的寿春一带还留存着许多楚文化的遗迹;其下游为吴国之地,与吴越文化不可分隔;又与中原地区、齐鲁地区直接相连,其文化亦自然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两个地域文化的影响。上面所讲到的淮河文化具体内容中大多属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以广陵(现扬州)为中心的淮扬文化应属于吴越文化;楚文化则几乎是淮河中上游的主体文化。因此,从源头上来说,淮河文化是由这4种地域文化交汇而成的,也可以说淮河文化受到过这4种文化的影响,其中有这4种文化的某些元素存在,但不宜说淮河文化包含了这4种文化,把它们的一些代表性文化都归属于淮河文化。

从上述早期淮河文化的这种由多流域多地区文化因素合成的状况来看,其特质所在主要有5点:一是多元性,即多种文化共存并蓄,虽然其他流域文化也会有多元性存在,但淮河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二是双边性,即上中下游与相邻的另一地域文化相交、相融,不仅有流域文化的交融,而且有国族文化的交融;三是依存性,由于构成淮河文化源流的相邻4种国族文化和黄河、长江两个地域文化都处于比较强势和成熟的地位,而淮河本土文化则尚未形成明显的主导文化,只能在不同区位和不同时期依存于周边的某一种文化;四是兼容性,多种文化能够共存共处,而且长期保持,这无疑使淮河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五是开放性,即对外来文化的一种接纳和融入状态,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不拒任何外来文化的开放性格。当然,这里所说到的淮河文化,大都属于精英文化或政治文化,而社会文化基本没有涉及,有待开发和研究,理应有土生土长的淮河文化存在,其构成和特性或许会是另一种状态。

二、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关系的历史变迁

淮河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又是北方和南方的分界线,不可避免地成为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北方文明与南方文明的交汇和交流之地,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提出的“过渡”地带,这应该是淮河文化产生发展及其内容构成的重要外部原因,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淮河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在已有的淮河文化研究中,较多关注淮北的以中原文化和齐鲁文化为主的黄河文化,较少涉及长江文化,且也少有出自与长江文化关系的角度。引入黄河文化,当然可以拓展认识淮河文化的视域,突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扩散,但是忽视长江文化则会盲视淮河文化的多途来源和发展后劲。

其实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连带关系,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据考古发掘和研究,位于苏北东部兴化市和东台市交界处的蒋庄,西至淮安市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既是钱塘江流域良渚文化北上进入淮河下游地区的标志,也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是良渚文化与当地文化因素融合后的产物”。^[4]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最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它进入淮河下游地区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另一种良渚文化,这无疑是目前已可证实的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存在连带关系的最早史实。到春秋时期,淮河下游地区直接作为吴国的一部分,其文化无疑会受吴越文化的影响;在春秋后期和战国前期,越国兼并吴国而进入淮河下游地区,并一度迁都琅琊(今临沂),而吴越文化是这一时期长江下游的主体文化,两者的关系应该更为密切了。同时,楚国逐渐扩展至淮河中上游地区,并在战国后期占领越国的淮河下游地区,整个淮河两岸皆成楚国之地,其文化也就不能不受荆楚文化之影响,而荆楚文化的核心因素是长江文化。因此,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淮河文化经由吴越文化和楚文化而受长江文化之影响约达500年之久;其下游地区,如从良渚文化北上算起则时间更是长达几千年了。由

此可以说,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关系源远流长,甚或因为政权统属的因素而使其密切程度要高于与其他周边文化的关系。

秦汉一统中国以后,淮河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发展,其最主要的缘由是淮南王国的设置。西汉初年,设淮南王国,地跨长江南北,先封楚人英布为王,后封汉室的刘长、刘安父子相继为王,先后以六安和淮南的寿春为都城。这无疑会促进长江文化、淮河文化的交流、融通和互动,其标志性表现是由淮南王刘安主持的两部文化作品。

一部是《淮南子》。据《汉书·艺文志》所记,它分内外两篇,内篇21篇,外篇33篇;^[5]又据唐初经学家颜师古所注“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今所存的有21篇,应为内篇。成书之初“号曰‘鸿烈’”又称《淮南鸿烈》。汇合发展道、墨、法、儒、阴阳诸子学说而成,既博大又明理。至于该书后来为何又称为《淮南子》,已有所论尚未厘清,其个中缘由,据东汉经学家高诱所记:到西汉成帝朝时,因“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6]又据清代训诂学家庄逵吉所记,到东汉时,“志论次儒家至小说,名曰诸子十家,后遂缘之而加子字矣。”^[7]这就是说,由于《汉书·艺文志》依次记载了从儒家到小说家10种学派,遂按照诸子范式在“淮南”后加了“子”字,正式称为《淮南子》。同时,刘安也被称为“淮南子”,高诱在《淮南鸿烈·叙目》中开篇就说:“淮南子,名安。”^[8]由此,《淮南鸿烈》和刘安均被列入诸子之流,这意味着他们已获得官方的认可和文化地位的提高。关于它的成书过程,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序》记: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人数千人”,“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楚人)、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9]这就是说,此书由刘安及8位骨干和招自“潜伏山谷”的众多诸学之人一起著成,这众多作者应来自四面八方、长江南北。《淮南子》从内容到作者均表明它合各方各学而成,表现出融合诸学的倾向。

另一部是《淮南王群臣赋》44篇。该书留存下来的虽仅为《招隐士》^[10]一篇,但亦显示了对长江文化的吸收。其作者或为淮南小山;其用意所在,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隐士”是指屈原,为“悯伤屈原之作”;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说,此赋“为淮南招致山谷潜伏之士”而作。无论其为谁而作,重要的是其风格出色地承续了屈原、宋玉所创楚辞离骚体。王夫之有评论说:“其可从类附《离骚》之后者,以音节局度,浏漓昂激,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词赋之比。虽志事各殊,自可嗣音屈(屈原)宋(宋玉)。其辞致磅礴弘肆,而意唯一致,真得骚人之遗韵。”^[11]再者,“招隐士”如此重大之事,而采用楚辞这样的文体,意味着刘安及群臣们对楚辞的高度欣赏,抑或所招之“隐士”对楚辞情有独钟,无疑是接受楚文化的一种表现。

因此,这两部作品典型地表现了淮河文化的多元性、兼容性和开放性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及黄河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此外,这种融合还导致淮河文化的一次重要转变,即本土政治文化和核心文化从无到有的转变。就淮河干流区域文化而言,现有的研究尚未揭示出淮河本土文化此前有比较明显的政治文化和核心文化,自《淮南子》起则改变了这一状态。其内篇所论的“道”,并非专指道家,而是包括天地之道、人间之道、治国之道,最终目的是治国之道。其“要略”中说:“故著书二十篇(不含要略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其具体论述散布于多个篇章之中,如《汜论训》说:“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常有常,而利民为本。”阐述了治国必须以民为本,应时改制的道理。《主术训》说:“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论述了君王自身道德修养及其为民表率、化民以德、至国安宁的重要性。又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认为君王治国与

国家建设、民生经济至关重要。《泰族训》说:“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乱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悖谬之事矣……则百残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主张以仁知治国,知人善任,依理办事,以达政通人和之境。这可谓是对孔孟治国理念的吸纳和发展,并因其为王家所著、所行,自然居于淮河文化的核心地位。

此后,长江文化对淮河文化的影响逐渐扩大和深入。隋唐时期随着南北运河的开通,加之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江浙物品和商人循运河进入淮河流域者逐渐增多,不仅带来了商业经济交流的发展,而且带来了民间文化的交流。南宋至明清,江南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两淮盐业和盐商迅速兴起,元代开通京杭运河,明代初期迁移大量江南富户到淮河地区;同时国家主流文化重心南移,如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明代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朴学,以及清代的浙东学派,相继成为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者;明代设立南直隶,清代顺治朝设立江南省,均将安徽和江苏合为一体,历时近280年,到明末清初时所收赋税约占全国三分之一,科考取士约占全国二分之一,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无疑使长江下游区域与淮河区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日趋扩大。

到了近代以后,随着江南地区现代性工商业产生发展和交通工具的改进,又有新生的洋务文化、维新文化、共和文化、五四新文化、革命文化的交替兴起,不仅进一步推进和扩大了与淮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交流,特别是南通、连云港、宿迁、淮南、淮安的一些官绅,或受江浙沪地区官绅及自强救国思潮影响,陆续创办了一些近代工矿企业,或参与了江浙沪地区的维新、立宪和革命活动,并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文化和救国思想,诞生了一批新式的思想家和文化人。

总之,淮河文化和经济受外部的影响,在隋唐之前主要是来自北方,隋唐之后,特别是南宋之后,则逐渐转向以南方为主,长江文化与淮河

文化的通融渐趋紧密,并成为淮河流域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三、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建设中的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

区域历史文化或经济的研究之所以成为一个迅速兴起的学术热潮,是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区域发展战略的推动直接相关,既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也受到各地学界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从深圳特区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显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是区域发展。从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政方针,并随即设立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到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等一系列的区域发展战略,除了提出某一区域发展的要旨、路径、布局等方针之外,几乎在每一个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中都贯穿着“联动发展”“协调发展”“个性化发展”(“差异化发展”)等理论,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精辟的区域发展思想体系。

由习近平亲自谋划和推动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12]制定了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建设的重大发展战略。其中提出:要“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要“强化区域联动发展”。旨在由上海“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再由三角洲“引领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包括区域内各地各城的联动,也包括与区域外围地区和城市的联动。在文化方面,要“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

以习近平的区域发展思想为指导,检讨区域文化史的以往研究,对布局未来研究,有很多问题有待开拓和深化。在以往的区域文化史研究中,大多是就区域论区域,注重于本区域文化的生成变迁状况,这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从区域

文化发展变化来说,这样的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要重视本区域与外区域之间的融通和联动、互动状况,更好地把本区域与外区域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淮河文化的研究亦需着力于此。

淮河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它的已有研究较之其他流域文化研究显得比较薄弱,无论是与本土文化还是与外地文化关系,特别是与长江文化关系,都值得大力开展研究;从安徽省的地方文化角度来说,淮河文化研究,应以本省境内的淮河两岸文化为重点,以便更好地为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建设服务。这里略谈几点浅见。

就本土文化的研究而言,它是淮河文化的根基和本源,虽已有一些研究,^[13]但尚有不少领域值得进一步加强和开发。所谓本土文化是在本地气候、地理、经济、民生等环境下而产生形成的文化,它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受时代和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所变迁,但其根基是植于本土之中的。

一是抗洪文化。淮河地区在历史上是水灾多发地区,当地人民政府在与水灾的长期抗争中积累和形成了丰富的抗灾、救灾、避灾、减灾的经验,乃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值得很好地挖掘揭示。

二是民间文艺。包括淮河两岸民间流行的戏曲、说唱、歌舞等多种形式,特别是像花鼓灯和花鼓戏、淮海戏那样的文艺种类,源远流长,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流行的民间文艺,覆盖面较宽,甚或整个淮河流域,乃至成为民间的一种谋生手段和文化产业,其中的源流变迁、艺术价值、发展缘由值得提炼和总结。

三是淮河文化带。最近几年,随着经济带建设的兴起,文化带研究和建设亦日益受到关注,如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运河文化带等。淮河全长近千里,穿越豫皖苏三省和多个城市,又与运河交汇于多处,它们所内涵的文化既有同类性更有差异性,可谓丰富多彩、各有千秋,并与运河文化带交相辉映。加强以淮南(寿县)、淮安为中心,延及东西两端的淮河文化带研究,进一步沟通皖北与苏北、豫南的文化联结,更好地呈

现淮河文化的整体面貌,为当今的文化旅游产业提供历史文化资源。

就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关系的研究而言,这是淮河文化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内涵着与长江文化的交融和互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开拓和深化。大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首先是移民文化。由于淮河流域相对于长江流域既是一个灾害频繁、战事多发地区,又是一个交通枢纽地区、拥有独特资源地区,还曾几度成为政治中心地区,从而造成多种原因的移民,而且历史悠久,持续不断,可以说淮河两岸,尤其是中下游,基本上是一个江南人的移民社会。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良渚文化人群迁入淮河中下游地区;战国时期有楚人、吴人、越人迁入;秦国灭越后闽越遗民集体迁淮;到明代又强迁江浙人口数十万至淮河中下游。除了这些军事、政治性的移民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性移民。从事各种贸易和运输的商人,大多选择永久地或流动地在淮河沿岸重要城镇居住经商。单是盐业商人一类,明清时期有众多的徽州盐商在正阳关等地经商。据有关研究,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歙县许赠和亲朋故旧在正阳关经商,他逝世时“挽者三千人,观者万人”。^[14]有的甚至累世几代。^[15]这些移民无疑带来了各自故土的文化元素,又在迁居地生产出新的文化形态,值得做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其次是商业文化。明清时期淮河中下游地区有些城镇工商业曾有相当的发展,也聚集了较多的江南商人。如淮安、正阳关是南北商品转运集散中心,国家重要税关所在地,商业繁荣,商人会馆众多。据有关介绍,仅淮安一地就有江南各地商人建立的江宁会馆、镇江会馆、四明会馆、江西会馆、新安会馆、福建会馆等,一个会馆代表着一个商帮的形成。这意味着进入淮河地区的江南商人和商业文化已相当发达,但尚未见及研究成果,值得深入挖掘。

第三是融入机制。上述这些众多的进入淮河流域的长江文化,它们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融入当地社会,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促进淮河文化的发展,其中的路径和机制是值得很好研究的。除了政治上的强制性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机制,如营商环境、生活环境,以及这些环境的营造因素。

总之,无论是历史经历还是现实需要,对安徽的淮河文化研究来说,不仅需要继续深入挖掘淮河文化的内涵和精神,更应重视淮河文化和长江文化关系的研究,为皖北更好地融入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建设提供历史渊源和借鉴。

注释:

[1]有关情况参见陈立柱:《淮河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反省》,《学术界》2016年第9期;吴海涛:《近十年来淮河流域历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5期。

[2]参见〔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济水篇”。

[3]其中重要的著作有:侯仁之主编:《黄河文化》,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年;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黄河文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张新斌:《济水与河济文明》,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刘锋执行主编:《中华长江文化大系》(第64卷),武汉:长江出版社,2008年。

[4]林留根:《江苏省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16年2月2日。

[5][7][清]庄述古:《庄序》,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

[6][8][9][东汉]高诱:《叙目》,第2页,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2页。

[10]参见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

[11]参见王夫之:《楚辞通释》卷十二“招隐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2]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2019年12月3日。

[13]参见李敬民、李颀、胡南:《淮河流域民间音乐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14]关传友:《论寿县正阳关镇的历史地位》,《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15]参见王振忠:《晚清扬州盐商研究——以徽州歙县许村许氏为例》,《地方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责任编辑:李本红〕